李仰南：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李仰南（1911-1984年），原名李吉有，又名李学文，后化名李仰南、杨学文、杨维宝，山西省新绛县人。1911年10月出生在一个富裕农民家庭。1929年4月，经汪明、嘉寄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委，任命李仰南为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李仰南先后在宁夏、延安、陇东一带工作。1984年，病逝于沈阳，享年73岁。

幼时在新绛县横桥乡宋村小学读书，15岁高小毕业后，考入新绛县国民师范。不久，因闹学潮被开除，转入夏县堆云洞平民中学上学。当时是大革命时期，在校长嘉寄臣（嘉康杰）影响下，接受革命思想，并培养了艰苦朴素、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1927年经乔宴会、王月春介绍加入共青团，随嘉寄臣进行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平民中学被解散，李仰南回家乡任小学教师，但仍与嘉寄臣等人保持联系。1929年4月，经汪明、嘉寄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任党支部书记，后任中共运城河东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

1931年10月，李仰南在一次运送武器途中遭敌逮捕。在法庭上，他机智辩解，没有暴露身份，被关押1个多月后，经地下党组织营救获释。11月，中共山西省委遭敌破坏，中共河东县委关于李仰南被捕获释的报告落入敌人手中，他又在新绛县遭敌逮捕。在敌人多次审讯中，他始终假称在家受继母虐待，因给朋友引路运送武器被捕，被判刑12年半，关押在山西省第一监狱。在狱中，他参加了以郭洪涛为书记的地下党支部领导的绝食斗争。1934年末，根据中共山西省委指示，他和第一监狱的其他政治犯一起进入阎锡山的山西省反省院。1936年初，取保出院回到家乡。同年春，红军东征渡黄河到新绛一带，李仰南参加了红军第八十二师，并详细地向组织报告了自己被捕经过及在第一监狱和反省院的全部情况，党组织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先做地方工作，后任组织科干事。5月，红军回师陕北，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李仰南进行审查，宣布1931年11月被捕后，在狱中写“悔过书”是自首变节行为，开除党籍，调离部队，派到中央党校任文化教员。不久，中央党校告知他，根据中央组织部意见，按特别党员对待。1937年3月，又重新入党。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委，抽调中央党校少数民族工作干部班班主任李仰南、党支部书记何广宽和学员薛天敏、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委员会回民工作部部长杨一木以及在定边工作的苏文等人参加中共宁夏工委工作。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宁夏广大人民群众，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逼马鸿逵抗日，一旦日寇侵占宁夏，立即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杨一木因在定边工作期间与宁夏方面的人员接触较多，曾向中央提出他不适合去宁夏国统区做秘密工作的意见，要求另外派人负责宁夏工作。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遂又任命李仰南为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并指示立即赴宁夏开展工作。11月，李仰南通过张子华和赵统儒写信向宁夏进步人士袁金章、雷启霖介绍，经定边到达宁夏省城，以商人身份先在省城东郊掌政桥一个开小商店的山西同乡家落脚，然后进城见袁金章，并通过袁金章、高立天的关系，以实验小学庶务主任的名义作为职业掩护。袁金章又把李仰南介绍给黄渠桥第二完小教师王振刚（王茜）。李仰南请王茜带领何广宽去尾闸见雷启霖，拟动员他出来工作，掩护地下党活动。接着李仰南又去平罗、石嘴山一带，通过王茜、雷启霖结识了李冲和、叶松龄、雍民飞、贺闻韶、刘廷栋等进步人士和青年教师。之后，李仰南又去吴忠、宁朔、中宁等地了解情况，先后与梁大均、马云泽等人建立了联系。

1938年春，李仰南返回定边、延安汇报工作，并要求上级党组织继续派人来宁夏工作。4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中共三边特委先后从延安和定边派苏文、肖子珍等中共党员来宁夏，充实了党在宁夏的力量。

以李仰南为书记的中共宁夏工委，利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有利时机，很快打开了局面，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培养革命骨干分子，开展学运和兵运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1937年秋，新安旅行团来宁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对宁夏抗日宣传影响很大。宁夏实验小学进步教师杨文海、薛云亭、涂春林等在校长高立天支持下，以高年级学生为主，组织成立了“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后改名为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团员100多名），在宁夏省城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1月，李仰南来到实验小学，积极支持少战团的活动，并与杨文海以山西同乡关系同住一间宿舍。经考察帮助，先后吸收杨文海、薛云亭、高立天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宁夏少战团成为中共宁夏工委领导之下的群众性团体，按照党的工作方针开展各项活动。1938年春和暑假期间，宁夏少战团曾两次赴省城以南和以北各县主要集镇进行抗日宣传，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中有很大影响，宁夏少战团的巡回宣传活动，大大促进和带动了各地学校学生抗日团体的建立和抗日宣传活动的普遍开展。在这一时期，宁夏中学、省城学堂巷小学、贺兰金贵乡小学、立岗堡小学、平罗县姚伏堡小学、平罗县城小学、黄渠桥第一完小和第二完小、石嘴山小学、宝丰小学、中宁恩和堡小学等学校先后建立了学生抗日团体，并与宁夏少战团有一定联系，在宁夏各地的抗日宣传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

争取团结进步人士，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仰南及工委其他成员，利用1937年秋张子华回宁时同袁金章、高立天等人秘密建立的统战关系，分头到省城、银南、银北等地进行联系。争取团结了袁金章、雷启霖、王振刚、李冲和等一批中上层人士和教育界师生以及商人中的同情、支持者，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队伍。同时，通过这些代表人物，进一步团结了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方面的社会人士，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掩护了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支持了党的工作。

发展一批共产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李仰南及工委其他成员，通过实际工作的考察了解，先后在宁夏各地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组织的力量。1938年中共宁夏工委下属5个支部，32名党员。

动员选送30余名进步青年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学习。他们毕业后，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有的做地方工作，有的又于1939年派回宁夏参加地下工作，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开展兵运工作。李仰南来宁夏前，党组织交给了他在宁夏马鸿逵部队的几个关系：一是驻石嘴山的马英才旅部副官苗培植，一是驻宁夏新城某旅参谋。李仰南到宁夏后，先与苗培植取得联系，然后通过苗培植把1937年12月从边区派来的中共党员李维钧安排在该旅五团三营八连，以当司书为掩护做兵运工作。李仰南根据上级指示，给李维钧布置任务：不在友军中建立党的组织，不拉队伍，主要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通过朋友讲形势，开展抗日宣传等方式，提高友军官兵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使他们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自觉抵制和反对马鸿逵对日寇的妥协活动。1938年春，当李仰南得知1936年11月红二、四方面军经过宁夏向陕北转移时，四方面军曾有一部分人员被俘，在马鸿逵工兵营做苦工的消息后，提交工委研究，决定设法同这部分人取得联系，使之成为建立武装的骨干。李仰南派中共党员肖子珍开展此工作，很快与工兵营一位四川籍女同志取得了联系，开展了对被俘红四方面军人员的工作。后因马鸿逵对部队统治很严，收效不大。

1938年秋季起，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国民党宁夏当局防共、反共活动逐步升级，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处境困难。马鸿逵下令取缔抗日团体，追捕共产党人，李仰南等人被曾经混入三边的马鸿逵部特务马子成发现，难以立足。李仰南觉得自己不宜继续在宁夏工作，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另派人来接替他的工作。同时，不顾个人安危，继续留下来，化装成商人，改名杨维宝，秘密进行工作，保护被敌追捕的党内外同志撤离宁夏，使所有在宁夏的中共党员没有一个遭敌逮捕。1939年10月，中共中央讨论了宁夏工作问题，并决定派崔景岳来宁夏接替李仰南，建立新的中共宁夏工委。12月下旬，李仰南与崔景岳在中宁“协记号”商店接头。然后一起到各地交接工作。崔景岳接任工委书记。1940年春节过后，李仰南回到延安。

1940年春，李仰南在中组部招待所候职，并对中共宁夏工委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同年冬，参加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中央党校组织的《抗战中甘宁青党的工作》一书的编写工作。

1941年春，李仰南先后任中央民族学院班主任、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少数民族组干事。1942年夏，任中共甘宁工委委员、宁夏工作部部长。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李仰南1931年被捕问题再次进行审查。当时，原和李仰南在山西第一监狱和反省院的大部分同志都已到延安，提供了确实可靠的证明材料。经审查，根据《关于履行手续处理办法》决定，恢复了他1929年党籍。同年冬，又被调往环县县委任统战部部长。1943年夏，调回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李仰南随中央党校干部大队赴东北工作，先后任中共黑龙江省通北县委书记、黑龙江赴光农场场长、辽宁本溪煤铁公司人事处处长等职。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后勤五分部政治部干部科长，1953年秋，回国后又先后任长春六三六厂副厂长、沈阳俄文学校校长、沈阳机械制造工业学校副校长、沈阳工学院党委副书记等职，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1973年6月，因病休养。1984年，病逝于沈阳，享年73岁。**（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蒿店兵变：诞生宁夏第一支红军部队

青砖墙古朴厚重，默默见证着历史沧桑。城墙门洞上“蒿店镇”三个大字，历经近百年风雨侵蚀依然清晰可辨，见证着蒿店兵变那段历史。

蒿店兵变旧址位于泾源县六盘山镇蒿店村，地处西安至兰州公路上的交通要道，南北两侧都是高山峻岭，行军作战便于隐蔽，易守难攻，沿山向东经彭阳可直通陕北。

上世纪30年代初，曾在这里发生了由中共陕西省委策划组织领导的固原第一次有影响的武装暴动，史称“蒿店兵变”。这次兵变，创建了宁夏第一支红军部队，打响了宁夏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

1932年4月，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最疯狂的时期。中共陕西省委为了贯彻《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精神，积极扩大军事力量，继组织发动“靖远兵变”之后，决定由陕西省政府政治观察员陈云樵潜入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邓宝珊部搞兵运工作。

邓宝珊派陈云樵到“行署干部补习队”的军官队担任区队长。“行署干部补习队”下设军官、士兵2个队。军官队学员多为邓宝珊旧部、冯玉祥的部下和阎锡山介绍来的部分人员，成分极为复杂。士兵队学员多为招考进来的，主要培养班排长一级军事骨干，成分较为单纯。

其中，任士兵队队长的李华峰和下属2个区队长、9个班长全部是共产党员，可以说士兵队基本掌握在党组织手里。

陈云樵到达兰州后，首先和甘肃特委负责军事工作的孙作宾进行组织联系。按照党组织在士兵队开展活动的决定，陈云樵和李华峰经常研究形势，教育党员，争取学员，发展壮大党的力量，使党的地下工作迅速有效地开展起来。

1932年9月，蒋介石为笼络邓宝珊，调拨给其德国造步枪800支、驳壳枪200支，以及一批弹药，决定于9月中旬经甘肃平凉运抵兰州。

为把这批武器弹药从西安经西兰公路安全运到兰州，邓宝珊派行署干部补习队260多名官兵到平凉接运。

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秘书长的地下共产党员南汉宸得知后，立即报告了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夺取这批武器弹药，扩大补给刘志丹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遂派省委常委兼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带周志学到平凉开展具体工作。在平凉，李艮与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刘杰三和李华峰，以及时任补习队军官队区队长的陈云樵（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委员）接头联系，共同研究夺取武器方案。

李艮、李华峰等具体分析敌我情况后，认为前来平凉接运枪支弹药的行署干部补习队官兵里，中共地下党组织控制了一半，士兵队的130多人全部掌控在李华峰手中，决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分析认为，平凉是国民党陇东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又是西兰公路必经的交通要道，在这里组织兵变危险性很大，决定避敌重兵，将兵变地点选择在距离平凉西北35公里，即出平凉到兰州的第一个驿站——六盘山下蒿店镇。李艮任兵变的总指挥，刘杰三留守平凉策应。

1932年9月18日，干部补习队从平凉接到枪支弹药，沿西兰公路返回，至平凉西北的蒿店镇宿营。当晚，士兵队住在镇西街，干部补习队队长楚则先、教育主任姚亮和军官队住在街东头。

根据当晚宿营情况，李艮、周志学、李华峰、陈云樵等立即秘密召开会议，决定抓住有利地形和战机，在晚11时部队全部休息后开始行动。并对兵变进行具体部署，要求全体兵变官兵一定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确保圆满完成任务。

明确各自任务后，陈云樵回到驻地，把晚间岗哨撤进所住院子里，叮咛站岗的哨兵关好院门，在院中听候信号。他又到班里要了一支冲锋枪带在身上，随时等待行动。李华峰带着士兵队全部压好子弹，和衣佯睡，等待行动命令。

暴动计划被补习队队长楚则先所察觉，并命令加强了岗哨，还将自己的住所从蒿店街道的东头军官队搬至西头的士兵队。加之兵变前，个别投机分子临阵退缩，携枪出逃，给原本就紧张的士兵队员思想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就在等待按预定时间行动时，蒿店河里传来狗吠声，哨兵误以为被敌发觉，遂向李华峰报告。李艮、李华峰派人查看，发现敌人竟然增加了岗哨，楚则先也转移了住处。鉴于情况突变，为了保存力量，随即决定提前行动，与陈云樵失去联系。

兵变后，蒿店镇笼罩在白色恐怖中。陈云樵依然坚守敌营当卧底，遭到敌人怀疑后被送到兰州审查。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周旋下，陈云樵历尽艰险被营救出狱，于1933年3月返回中共陕西省委。 **（据《宁夏党史故事》）**

冯福林——从宁夏走出的省军区副司令员

贺久杰

1965年至1987年，我在山西省雁北地区朔县师范学校任教，冯福林时任雁北军分区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雁北军分区司令员、山西省大同市革委会主任、雁北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雁北地委副书记。在山西省任教时，曾听过冯福林司令员的讲话，但不知他是宁夏盐池县人，邂逅看到石家庄市烈士陵园一墓碑，才得知所以。碑文：

冯福林（1919-1975）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人。1935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78师4团12连战士。抗日战争时期，历任115师678团4连战士、344旅689团12连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10旅警卫排排长、新四军四师骑兵团五大队区队长、训练班学员、一大队副大队长、警卫大队大队长、五大队大队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9纵73团3营营长、2纵5师13团参谋长、21军62师184团副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184团团长、教导团二大队大队长、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科学员、61师副参谋长、62师副师长、山西省晋北军分区副司令员、雁北军分区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雁北军分区司令员、山西省大同市革委会主任、雁北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委副书记等职。参加过小城堡、平型关、孟良崮、淮海、渡江及抗美援朝、西藏平叛等战役、战斗。1955年晋升上校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75年6月15日因公牺牲。

（作者系宁夏政协退休干部）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典范

罗曼·卡尔曼是苏联及国际著名的新闻电影摄影师、导演、作家。1938年9月，他奉苏联政府之命到中国报道抗战。后来，罗曼·卡尔曼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撰写了《在华一年：苏联电影记者笔记（1938—1939）》。该书在1941年5月出版了俄文版，在2020年8月出版了中文版。该书是一部记述抗战全面爆发初期中国军民团结御敌、抵抗侵略的纪实著作，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历史价值。作者在书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作了专门论述，给予很高评价，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民族解放英勇奋斗的历史画卷。

“边区（特区）建立了真正的民主管理模式”

罗曼·卡尔曼在书中全面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特区）的历史及民主管理模式。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建立的民主管理机构，是在普选基础上产生的。人民代表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边区的民主还体现在选出的政府成员的生活条件上。他们在工资、服装、工作等方面与边区其他居民毫无二致。为了贯彻依靠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边区政府放手发动群众，建立起“自卫军”“农民联合会”“工人联合会”等组织，积极帮助抗战前线，维护内部秩序，在最大程度上组织了群众。罗曼·卡尔曼得出结论：“可以说，在中国这个边区（特区）建立了真正的民主管理模式。”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组织经济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书中写道，边区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增加农业种植面积，大规模生产食品，并组织农民使用化肥、进行人工灌溉，增强了抗旱能力，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同时，将属于地主的大部分土地国有化并分给了农民，大大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边区还设立“农业贷款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组织，积极帮助贫困农民，促进经济发展。通过采取一系列举措，边区建立起纺织厂、皮革加工厂、造纸厂、农具厂及很多手工业作坊，大小牲畜存栏数达到近100万头，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提升。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文化建设和教育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罗曼·卡尔曼写道，在边区建立之前，这一地区的人口识字率不超过百分之一，小学只有120所，学生只有1200人。边区建立后，政府重视文化教育建设，建起800所小学，学生总数超过2万名。在边区首府延安，集中了全中国著名的抗日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和众多的技术学校。边区还建立起很多演出团体，如“边区民众剧团”“抗战剧团”“烽火剧团”等，有的团体还上了前线。边区还采取有力措施消灭文盲。通过一系列举措，边区群众学习文化的热情不断高涨，边区群众的识字率逐渐提高。

“可以大胆地把延安称为一座青春城市，一座抗日青年的城市”

延安是边区政府所在地和主要城市。罗曼·卡尔曼发现，延安虽然不大，条件艰苦，甚至有一半以上的房屋在日军的轰炸中被摧毁，但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吸引着青年们从全国各地汇集到这里。他认为：“可以大胆地把延安称为一座青春城市，一座抗日青年的城市。”他在书中提到，小伙子和姑娘们搭着便车，或成群结队地步行去往延安。他们知道艰苦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们，知道去延安的千里奔波和一年的学习仅仅是在华北战场、游击队和日军后方工作前的预备阶段。罗曼·卡尔曼认识到，这些青年之所以都充满着渴望，要把自己的力量、创造能力贡献给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事业，是因为抗战的思想已深植于他们的内心。

在书中，罗曼·卡尔曼重点介绍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青年学生。他了解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在建校之初就被学生们接受。学校教育特别重视军事和政治学习。这所大学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罗瑞卿向他介绍，学生必须有对民族独立斗争事业的忠诚。罗曼·卡尔曼通过观察学生们的生活得出结论，“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这样的大学生绝无仅有”。他分析道，学生们不是所有人都出身于无产阶级，其中很多人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铁的革命纪律已在他们生活中雷打不动。任何一点违反纪律都会进行讨论。严格的自我批评已经深入大学生整个社会生活之中。

“它鲜明地展示了共产党领袖与人民的亲密关系”

罗曼·卡尔曼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他在书中写道，在见到毛泽东之前，在去过的大学、小学、幼儿园，每一孔窑洞，所见到的一切都使他感受到这天才的组织者、领袖、思想家的精神。他的名字被热烈地到处传诵。这充分体现了边区人民对党的领袖毛泽东的爱戴和拥护。

当罗曼·卡尔曼到达毛泽东住的窑洞时，发现这个窑洞与延安青年学生住的其他几千孔窑洞毫无区别。在与毛泽东会见时，他发现，毛泽东平易近人，穿着朴素，办公条件非常简朴。毛泽东穿一身灰布军便服，外面又套着一件又肥又大的针织短衣，脚上穿一双细绳纳底的帆布鞋。在他居住、工作的窑洞里，一张写字台、一张用粗糙木板钉制的床、几个放满图书的书架、一把藤椅，就是全部摆设。罗曼·卡尔曼在毛泽东艰苦朴素的生活中，找到了群众拥护他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和群众的关系是紧密而自然的。罗曼·卡尔曼有一次在山里偶然遇到刚从田地里收工的几个农民，发现他们像朋友一样跟毛泽东打招呼，停下来跟他说话。他们告诉毛泽东一些自己的需要。毛泽东两手撑腰，手指朝前，向农民询问一些事，给他们出些主意。交谈中，不时爆发出阵阵愉快的笑声。罗曼·卡尔曼拍下了这个生动绝妙的场面，认为“它鲜明地展示了共产党领袖与人民的亲密关系”，毛泽东是这样的平易近人，交谈时农民脸上毫无惊讶的表情，交谈后农民扛起铁锹继续赶路。

“我们将永远忠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罗曼·卡尔曼写道，毛泽东在与他的谈话中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依靠和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坚强决心。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开展的抗日斗争中，依靠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从不害怕困难。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中国人民的独立进行斗争已经有10多年。中国共产党在困难和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全中国人民赢得战争的意志坚定不移。因此，我们进行这场战争的前景是光明的。

书中写道，毛泽东在庆祝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战斗到底，这就是全国人民的意志。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目标，一个意志。我们必胜！”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抗日热情。随后，几千名青年人通过了大学生宣誓誓词。誓词中提到：“我们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优秀的子孙。我们将永远忠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宣誓，我们要把日本强盗从中国赶出去，要把建设独立中国的事业进行到底。”“我们将庄严履行我们的誓词。”罗曼·卡尔曼在书中向苏联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和顽强精神，向国际社会宣告中国人民一定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

罗曼·卡尔曼在离开延安时曾说，希望有朝一日，胜利的中国人民会在复兴的国家档案中找出这些影片来。如他所愿，现在我们可以在国家档案里找到他拍摄的珍贵影片，他的中文版的书也已在中国出版。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仅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据《学习时报》）**